

美国早期在北非巴巴里地区的军事行动探究

——以1805年美国远征德尔纳为例

李泽源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州 350007)

摘 要:1805年远征德尔纳是美国在第一次巴巴里战争中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此次行动从策划到实施历时四年多,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授权并由美国人直接参与领导的海外军事行动。在策划过程中美国一直标榜自身的“正义”性,但实际行动结果却存在着很大的现实性;同时反映了美国在“正义”“自由”宣扬下的对外活动根本是以自身利益为核心。

关键词:美国; 德尔纳; 的黎波里; 威廉·伊顿; 第一次巴巴里战争

中图分类号:K7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17)05-0035-06

1801—1805年,美国对北非海盗国家的黎波里^①发动战争,史称“第一次巴巴里战争”或“的黎波里战争”。美国发起的远征德尔纳^②在这场战争中引人注目,可谓是美国独立后首次在海外实施的军事行动。此次事件的最直接结果是迫使的黎波里统治者接受和谈,同时引发了美国一系列政治纷争。更重要的是,行动从策划到实施反映出美国对外活动中“自由”“正义”宣扬下与实际行动的矛盾性,体现出外交活动始终是以本国利益为导向。国内外学术界对北非—西亚地区问题一直颇为关注,特别是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以及后卡扎菲时代和北非地区极端伊斯兰组织活动猖

獗,使其尤为凸显。国外学者对美国早期与北非巴巴里地区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军事研究;二是以文化或宗教冲突为视角,阐述与北非海盗国家的关系研究;三是对参与个体研究。同时,对于这场行动中的关键人物——威廉·伊顿(William Eaton)的研究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③。国内此类研究相对较少,大多集中于军事方面^④。本文依托《美国国家文件》(*American State Papers*)以及各主要人物的通讯集等档案资料,通过对美国1805年远征德尔纳事件的探究,试图从一个侧面挖掘美国早期对外活动的特点以及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而反映美国早期对外活

* 收稿日期:2017-03-10; 修订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李泽源(1992—),男,河南濮阳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外交史。

① 今利比亚首都。

② 即今天的德尔纳,港口城市,位于利比亚北部。

③ 参见:Francis Rennell Rodd, General William Eaton: The Failure of an Idea[M], New York: Minton, Balch and Company, 1932; Louis B. Wright and Julia H. Macleod, The First American in North Africa: William Eaton's Struggle for a Vigorous Policy Against the Barbary Pirates, 1799-1805[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Louis B. Wright and Julia H. Macleod, "William Eaton's Relations with Aaron Burr"[J].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1945, 31(4): 523-536; Lawrence A. Peskin, "American Exception?: William Eaton and Early National Antisemitism"[J].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2016, 100(3): 299-317。

④ 参见:魏春洋、朱爽、赵芃《美国与北非战争》载《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56-57页;胡琪、田宇平、张学辉《战海盗:美国海军的第一仗》载《环球军事》2006年第123期第56-57页;魏子任、马爱国《北非海盗对美国创建常备海军的影响与启示》载《军事历史》2009年第4期第53-56页;刘博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海外作战——评美国围剿巴巴里海盗成果》载《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6卷第6期第79-83页。

动的本质。

一、巴巴里海盗与美国政府内部的抉择

十七十八世纪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央控制力的减弱,帝国逐渐失去了其在北非巴巴里地区的控制力,北非巴巴里四国——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各自为政。这四个国家位于地中海南端,依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从事海盗活动,通过劫掠过往商船、扣押人质、索要贡金等方式大发横财。这些行径着实令从事大西洋—地中海贸易的国家大为头疼。欧洲主要国家除了派出本国海军舰队对商船护航外,大多采取与北非巴巴里四国签订条约、缴纳贡金的方式来换取商船的航行安全。此举只需花费少量金钱而不必大动干戈,久而久之逐渐成为各国与北非四国交往的惯例。

独立后的美国要开展与地中海国家贸易,成为海盗国家瞄准的目标。美国商船屡次遭受巴巴里海盗的侵袭,船只货物被掠夺,船员被扣押。据统计,1785—1815年间,在地中海地区,阿尔及尔捕获美国商船22艘、的黎波里6艘、摩洛哥5艘、突尼斯2艘^[1]。仅在1793年10—11月间,就有11艘美国船只以及100多名船员被海盗俘获^{[2]15-16}。同时,被俘美国船员的悲惨境地传到国内后,在美国民众中激起了极大的同情。美国社会对政府不断施压,要求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公民的人身安全及贸易的合法权益。面对这般境地,如何应对巴巴里海盗,美国早期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其中以约翰·亚当斯为代表,主张通过与海盗国家谈判以及缴纳贡金来解决问题;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则认为应对海盗国家采取相对强硬的态度,组建一个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来保护本国公民^{[3]519-544}。其实亚当斯与杰斐逊都支持美国在地中海进行自由贸易,对巴巴里国家的行径深恶痛绝。二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应对巴巴里国家以及运用何种手段来保护美国的地中海贸易。亚当斯选择了谈判,所持的主要理由是此时美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发动一场战争。1786年6月6日,亚当斯在致杰斐逊的信中提出了三个问题,即美国与这四个国家(巴巴里国家)签订和平条约要花费多少钱;如果美国不签订条约将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失;如果美国与这些国家作战,将会花费多少钱^{[4]399}。并且亚

当斯对这三个问题逐条进行分析,认为综合各种情况下,只有与巴巴里国家谈判才能花费最小的代价得到最想要的结果。在7月3日致杰斐逊的信中,亚当斯就是否对海盗国家发动战争提出了四点看法:尽管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阻挠,但是美国应该花费一些金钱与巴巴里国家签订和平条约;即使在其他国家的影响下,如果美国不花费一些金钱,同样无法得到和平;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无法使美国花费的金钱减少或者增加;如果时间拖得越长,巴巴里国家向美国索要的金钱就会越多^{[4]406}。更重要的是,亚当斯认为虽然巴巴里国家向美国索要了数目不菲的金钱,但是与美国在地中海的贸易相比,这笔钱应该不为过多。美国不能因为巴巴里国家索要金钱而导致整个地中海贸易的巨大损失,这样做显然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如果海外贸易遭受损失,则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经济的发展。当然,亚当斯选择的谈判方式更多包含着对新生美国综合实力欠缺的无奈。在遭受损失后,只能被动地依靠谈判交纳金钱的方式来换取美国远洋商船的安全。

杰斐逊更偏向于战争。杰斐逊对巴巴里问题一直主张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并且不断建议美国应该建立一支海上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商业贸易。他在1784年11月11日给詹姆斯·门罗的信中说道:“应该最好需求一个平等的条约,如果他们拒绝,为什么不和他们开战呢?”^{[5]376}杰斐逊认为美国可以效仿欧洲国家与巴巴里海盗作战,况且当时欧洲的一些国家确实与巴巴里国家处于交战状态。而美国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海上作战力量至关重要。杰斐逊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继续我们的贸易,就应该建立一支海上力量”^{[5]376},美国可以通过舰船巡航来保障商船安全,并且将海盗国家各个击破。对此,杰斐逊在1785年2月致门罗的信中提出了两点计划:一是将美国的贸易交由有保护能力的欧洲国家船只运载;二是美国自己运输,但是建立一只海军来进行保护^{[5]398}。但是在当时刚取得独立不久的美国人眼中,军队被视为是集权与暴政的标志,军事力量的增强将会严重威胁自身的自由。对此,杰斐逊明确指出一支海洋力量不会危及人民的自由,也不会使海洋流血^{[6]150}。在主张建立军队并对巴巴里国家发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同时,杰斐逊还提出可以通过对欧洲商品进行额外的征税来弥补美国的损失,以

此迫使欧洲国家意识到保护美国利益的重要性^{[5]391}。杰斐逊对主张谈判解决问题的观点大加批评,将其称为“目光短浅以及必有所图”^{[5]398},认为如果美国同意支付赎金,那么就会刺激巴巴里国家对美国进行更多的海盗行为来获得美国的金钱。可见,杰斐逊与亚当斯在巴巴里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他们两人代表美国政府内部两种不同的声音,很难说哪种声音一直能够占取上风。而亚当斯和杰斐逊各自所秉持的观点,在各自的执政时期也得到很大的体现。

1797年,亚当斯当选为美国总统。亚当斯政府基本保持了华盛顿政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巴巴里国家采取了谈判方式来解决纠纷。值得一提的是,亚当斯政府所采取的谈判政策并不意味着整个亚当斯时期的外交策略都是“软弱”的。当国家利益遭受重大侵害时,亚当斯政府亦会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与法国之间的“X、Y、Z”事件以及美法“准战争”便是极好的例证。联邦党人执政时期关于美国在地中海问题的突出贡献便是美国海军的初步建立^[7]。这为之后美国在巴巴里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1800年革命后,杰斐逊担任总统,巴巴里海盗国家的黎波里以此为借口要求美国增加贡金数额,杰斐逊断然拒绝。愤怒的黎波里统治者以砍倒美国领事馆门前美国旗帜的方式对美国宣战,第一次巴巴里战争爆发。而一贯主张通过战争手段解决巴巴里问题的杰斐逊,正如其所言,“只有亮出自己的牙齿才会得到没有索取金钱的条约”^{[6]149},派出舰队远赴地中海作战。

需要指出的是,从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到1801年第一次巴巴里战争爆发,不论是以哪种方式解决巴巴里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始终没有宣称放弃使用武力手段。出现分歧的原因在于,美国早期领导人各自结合当时的美国综合国力及自身所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并且得出各自的判断。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周边环境趋于稳定,到了杰斐逊执政时期美国进行巴巴里战争,用武力解决巴巴里问题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

二、“正义”行动计划的两面性及实施

第一次巴巴里战争初期,美国的海上军事行动并未取得理想战果。为此,一些美国驻巴巴里地区的领事或代理人认为应该策划一场“特别”行动,通过利用的黎波里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纷争,

支持帕夏尤瑟夫·克拉玛尼(Joseph Karamanli)的兄长哈米特·克拉玛尼(Hamet Karamanli),进而推翻其统治,达到美国的目的。整个行动计划凸显了美国早期对外军事活动的两面性:

其一,行动策划者认为只有推翻的黎波里当政者的统治,扶植一个“亲美”的人物上台,才能保障美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安全,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这个计划最先由前美国驻的黎波里领事詹姆斯·L.卡斯卡特(James L. Cathcart)提出,由前美国驻突尼斯领事威廉·伊顿(William Eaton)不断完善并且付诸实施。他们反复强调废黜帕夏尤瑟夫的重要性,1801年7月卡斯卡特在致国务卿的信中写道:“要得到一个永恒的和平,就要发动一场废黜罢免现任帕夏,支持他的兄弟哈米特的革命……只要尤瑟夫帕夏活着,我们的贸易就不会安全……我们就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决定和平。”^{[8]699}卡斯卡特认为,如果美国扶植哈米特的计划成功,那么哈米特本人就会对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就可以将的黎波里置于美国在地中海贸易网之下。威廉·伊顿比卡斯卡特更加激进,他认为美国扶植“亲美”的哈米特不仅有利于美国贸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展现出美国的力量,进而震慑北非各国,意图一劳永逸。

其二,策划者为使行动贴上正义的标签,往往将的黎波里帕夏尤瑟夫刻画成为一个残暴的君主,渲染的黎波里统治阶级奢侈无道以及当地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这寓意着美国的这场行动演变为不单单是军事行动,更是将的黎波里民众从残暴统治中解救出来的“正义”之举,美国顺应的黎波里民心,得道多助,的黎波里帕夏则失道寡助。1801年9月,伊顿致信美国国务卿,报告“现在(的黎波里)国民对如今的君主十分不满,反抗的时机已经到来,美国对的黎波里的海上军事行动激发了民众反抗暴行的信心”^{[9]208}。他在12月的信中指出:“帕夏的臣民大多数认为反叛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在等待救援者(美国)。”^{[9]212}1802年8月卡斯卡特在致国务卿的信中提到:“尤瑟夫从头到脚都由黄金珠宝装饰,身边常伴有几百人的卫队和随从”,“的黎波里的居民对现在的帕夏抱有最大程度的恐惧,并且他们极大地渴望哈米特”,“没有什么行为比恢复哈米特的统治更正义的了”^{[8]700-701}。

伊顿等人各方面收集的黎波里的情报,在此

基础上勾勒出一个行动的大致框架,即陆上部队与海军配合,联合行动。其实,此时美国国内对于是否扶植哈密特推翻尤瑟夫的计划还抱有较大怀疑。为了获取国内支持,威廉·伊顿于1803年回到美国,向国内民众阐述自己的计划。“虽然一开始杰斐逊和麦迪逊对计划抱有怀疑,但是最终同意伊顿的计划,并把这个计划称作是很有价值的一小笔投资。”^{[3]519-544}几番讨论后,美国政府最终同意并授权进行这次行动。

1804年,美国政府任命伊顿为巴巴里地区的海军代理人,并让其接受美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塞缪尔·巴伦(Samual Barron)指挥。随即巴伦向艾萨克·赫尔(Isaac Hull)和威廉·伊顿下达命令,命二人前往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①和士麦那(Smyrna)^②。1805年2月23日,伊顿与哈密特在亚历山大港签署秘密协定,其中明确规定美国向哈密特提供海军支持以及现金、军火等物资,并且援助哈密特的陆上军队,有必要时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8]706}。双方决定从陆路穿越沙漠抵达德尔纳,随后伊顿等人组建了一支由美国人、希腊人以及阿拉伯人组成的远征队,共计400余人^{[9]303}。3月8日,远征队出发。4月25日,克服一系列困难后,远征队抵达德尔纳,26—27日,两艘美国战舰相继抵达。随即远征队在海军配合下向德尔纳发动进攻。经过大约两个半小时的战斗,远征队攻入德尔纳,进而控制了整个城镇。最终战斗以远征队的胜利而结束,同时标志着远征德尔纳行动以伊顿率领的远征队占领德尔纳而告终。

三、远征行动所引发的问题

虽然远征队成功地占领了黎波里重镇德尔纳,但是在此之后,美国内部围绕着此次远征行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在占领德尔纳之后,巴巴里地区的美国军事一线人员中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出现分歧,对继续进军还是借机和谈争执不下。早在远征队刚刚占领德尔纳的时候,威廉·伊顿就致信巴伦,提出应该以德尔纳为基地继续向黎波里进军^{[9]340}。伊顿担心美国政府的意图只是利用哈密特作为和谈的工具。这种忧虑不无道理,因为在

战争期间,美国方面就与尤瑟夫接触几次,试图和谈,但终因黎波里方面不肯放弃贡金要求而失败。对于这种情况,伊顿认为此时“不应该放弃,而且应该为了和平奋勇前进”^{[9]345}。但是巴伦以及美国驻阿尔及尔领事托比亚斯·李尔(Tobias Lear)更加倾向于利用此次机会与尤瑟夫和谈,用德尔纳换取被黎波里俘虏的300名美国人质。1805年5月,巴伦在给李尔的信中提到“现在确实是进行谈判的一个最好时机”^{[8]709}。他在致伊顿的信中解释其选择和谈的原因,巴伦指出“(与哈密特)合作过于昂贵和繁琐,并且希望渺茫”,甚至明确告诉伊顿:“我们的金钱、武器装备、食品物资都已经接近枯竭,如要继续的话哈密特只能依靠他自己的力量。”^{[8]711}最终杰斐逊政府选择与黎波里和谈,任命李尔为全权代表。1805年6月4日,美国与黎波里缔结和约,美国放弃支持哈密特,并且以6万元的代价换取了300名俘虏。条约签订后,李尔为自己辩解称:“这六万块只是用于赎回俘虏,但他不会为了缔结和约而给的黎波里一分钱。”^{[9]364}但是仍有许多美国人认为,这6万块就是变相交纳贡金的一种方式^[10]。

其次,战争结束后,随着行动参与人员的归国,一线人员间的直接分歧逐渐演变成美国国内的政治纷争。伊顿回国后,仍然坚持自己计划的正确性,他认为计划之所以没能继续进行下去,是因为有人从中作梗。为此,他极力抨击巴伦和李尔,批评他们过于软弱。而美国国内支持伊顿的人更是借此攻击杰斐逊政府及民主共和党,认为他们与巴伦、李尔沆瀣一气,并指责杰斐逊忽视了伊顿的功绩,同时放弃支持哈密特也是违背自身道义的行为。他们向国会提案,要求给予伊顿较高规格表彰,认为应授予金质奖章。但是国会认为虽然伊顿功勋卓著,但并不能与历史上授予金质奖章的事件等同^{[11]192},所以议案随之被否决。杰斐逊政府则认为伊顿在远征德尔纳前与哈密特签订的秘密协定有违美国对外原则以及所宣扬的立国传统。1806年1月杰斐逊致信国会提到:“一个未经授权的约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观点,不能被我们的政府所认可……一个建立在自由以及宽宏大量特性上的国家,获得其他国家的友好与尊

① 即今埃及亚历山大港。

② 今称伊兹密尔,港口城市,位于土耳其西部。

重,比仅仅只是金钱而有价值的多。”^{[8]695}但美国国内政治纷争最直接的受害者却是伊顿本人。伊顿不仅没有获得国家授予的勋章,而且直到1807年国会才批准对伊顿在行动中的损失以及垫付的钱财作了一小部分补偿。

综上可以看出,随着战争的结束,一个战略上的方针政策问题逐渐转变为美国国内政治纷争的工具。在政治的“皮球”下,无疑伊顿等行动策划参与人员成了“牺牲品”。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故而这一事件也成为反映美国国内政治特点的一典型案例。

四、远征德尔纳对美国在巴巴里地区的影响

有学者曾作出假设:“如果当时美国方面的地中海舰队司令是普雷布尔(Peble)而不是巴伦,伊顿的计划可能会成功。”^[12]很多研究者认为1805年条约签订得过于草率,政府应该继续支持伊顿和哈密特。他们大多赞同伊顿的观点,即解决巴巴里海盗的唯一途径便是摧毁它,美国应通过扶植哈密特将的黎波里置于美国的贸易体系之下。但是他们只考虑到占领的黎波里的作用,无限夸大了进军的黎波里的益处,忽视了伊顿远征军的实际战斗力以及进攻的黎波里所要承担的军事风险,对于的黎波里扣押的300名美国人质的人身安全问题并未提及。更重要的是,这一观点没有考虑当时美国的国力问题。漫长的战争消耗大量财力,美国是否还有继续支持进攻的黎波里的动力以及承担失败风险的能力都值得商榷。相对于上述观点,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与的黎波里和谈是明智之举。他们认为如果伊顿继续进军的黎波里可能会迫使尤瑟夫对300名美国人质作出极端行为。即使伊顿成功占领的黎波里,尤瑟夫也会携带美国俘虏逃亡利比亚腹地,继续负隅顽抗^{[2]257}。更重要的是,计划开始时美国内部以及海军中的支持度并不高,而且决策层的大部分人并不将希望完全寄托于远征行动^{[11]184}。究其原因,他们往往将其归咎于伊顿本人尖酸耿直的性格,以及伊顿与海军内部将领的关系并不融洽。这种观点同样只是关注伊顿的个人因素,忽视了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不论何种观点,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国家外交政策的多维性。尽管1805年美国远征德尔纳主要是针对北非海盗国家,但它却开创了美国对外武力干涉的先河,同时迈出了美国关于此类海外军事行动的第一步,其意义不容忽视。这次行动虽未能成功扶植哈密特,美国却成功将的黎波里纳入自己地中海贸易框架下,的黎波里也迫于美国压力转变成为一个“亲美”政权。战后,美国与的黎波里当局签订了1805年《的黎波里和平友好条约》,通过该条约美国攫取了包括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利益^[13]。至此,的黎波里成为美国在地中海贸易线的重要中转港口或补给站。其次,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势力得以极大增强,通过战争美国在地中海保有一支常驻地中海舰队,用以护航等任务,这使得美国在北非巴巴里地区始终保持着军事威慑。例如在1805年4月,代替巴伦成为美国地中海舰队司令的罗杰斯(Rodgers)便利用军事压力,迫使突尼斯当局放弃了对两艘的黎波里逃亡船只的庇护^{[2]267}。此外,美国一改过去依靠交纳贡金来换取自身贸易安全的方式,转而对北非巴巴里地区国家采取较为强硬的外交策略。其后同样利用战争手段,于1815年发动第二次巴巴里战争,迫使另一巴巴里国家阿尔及尔^①屈服。此外,随着美国在此地区力量的增长,势必会排挤其他国家在此地区的影响,对当时而言,尤其是英国的影响力必然受挫。此时恰逢欧洲在进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法顾及北非事宜,而美国借此时机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为之后发展提供了铺垫。

正如费玉清所说,美国向外扩张有三支利剑——商人、海军及传教士^[14]。美国早期在北非巴巴里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仅保障了地中海贸易的稳定,同时扩大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权益及影响力。这逐渐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外交活动的重要模式,至今对美国而言亦是控制和维护其在北非地区利益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 [1] MARTHA R E. “Insults Unpunished”: Barbary captives, American slaves, and the negotiation

① 即今天的阿尔及利亚。

- of liberty[J]. *Early America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03(2): 159 – 186.
- [2] ADAMS G W. *Our navy and the Barbary corsairs*, Boston [M]. New York and Chicago: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5.
- [3] SOFKA J R. The Jeffersonian idea of national security: commerce, the atlantic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Barbary War, 1786 – 1805[J]. *Diplomatic history*, 1997, 21(4): 519 – 544.
- [4] ADAMS C F.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Vol. 8 [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53.
- [5] FORD P L. *The work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 4 [M].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04.
- [6] FORD P L. *The work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 5 [M].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04.
- [7] FIELD J A. *America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1776 – 1882*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42.
- [8] LOWRIE W, CLARKE M. *American state papers: foreign relations*, Vol. 2 [M]. Washington: Gales and Seaton, 1832.
- [9] PRENTISS C. *The life of the late Gen. William Eaton* [M]. Brookfield: E. Merriam & Co., 1813.
- [10] LAMBERT F. *The Barbary Wars: American independence in the Atlantic world* [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5: 169.
- [11] WRIGHT L B, MACLEOD J H. *The first Americans in north Africa: William Eaton's struggle for a vigorous policy against the Barbary Pirates, 1799 – 1805*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 [12] RODD F R. *General William Eaton: the failure of an idea* [M]. New York: Minton, Balch and Company, 1932: 275.
- [13] MALLOY W M. *Treati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 acts, protocols and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and other powers*, Vol. 1 [R].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0: 1788 – 1793.
- [14] 费玉清. *美国与中国* [M]. 张理京,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291.

A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Early Military Action in the Barbary Region of North Africa Taking the United States Expedition to Derna in 1805

LI Zeyuan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expedition to Derna is an American military action of 1805 in the first Barbary war. The whole military action from planning to implementation, which lasted more than four years, is the first authorized act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leadership of oversea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planning the 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lways advertised her “justice”. But behind the actual results, there is a lot of reality. It also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American foreign activities under “justice”, “freedom”. The basic core is of self interests.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Derna; Tripoli; William Eaton; the First Barbary War

(责任编辑: 张 璠)